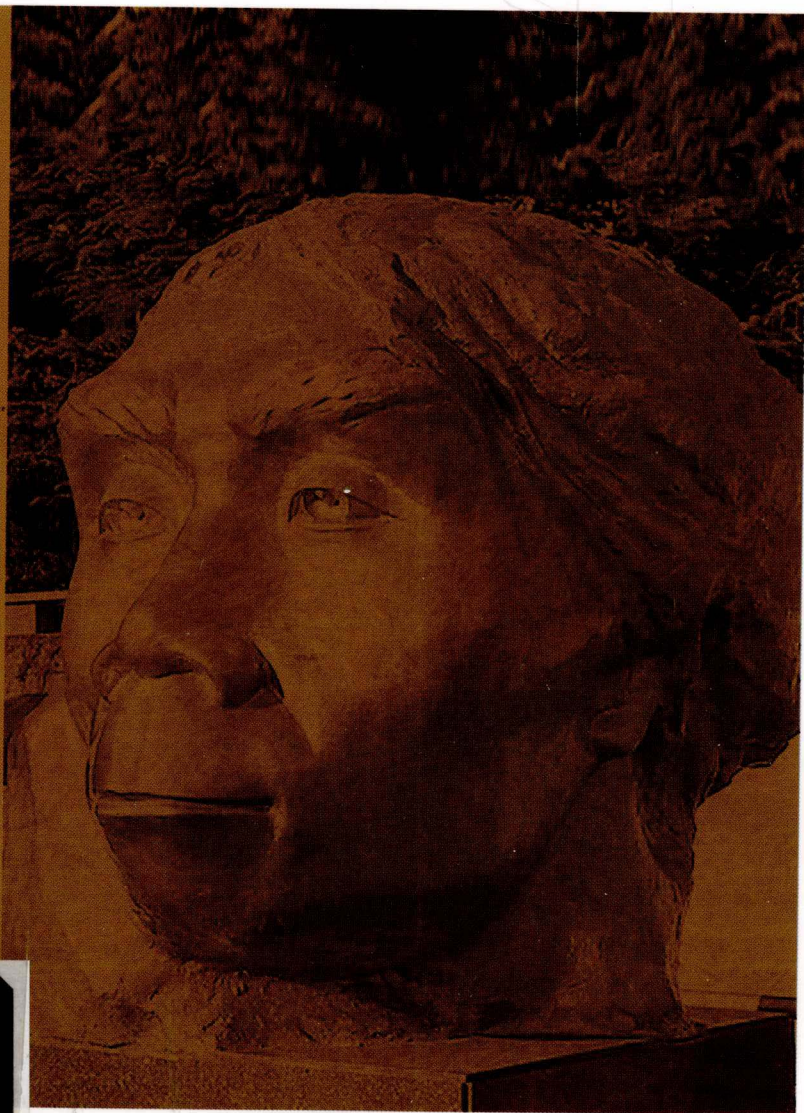


文化中国丛书

贾兰坡谈北京猿人

贾兰坡 著

④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何兹全 任继愈 主编

文化中国丛书

贾兰坡谈北京猿人

贾兰坡 著

主编：何兹全 任继愈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兰坡谈北京猿人 / 贾兰坡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11
(文化中国丛书)

ISBN 978-7-5358-4813-0

I. 贾… II. 贾… III. 北京直立人-普及读物 IV. Q981.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4891 号

总 策 划: 丁双平 胡 坚

执行策划: 吴双英

特约编辑: 赵宇泽

责任编辑: 胡隽宓 罗俊南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内芯设计: 罗俊南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75

印 数: 1-1800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
向本社调换。



总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维持下来，唯有中国这个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我国的文化文明史从未中断，一脉相承，屹立于世界之林，历久而弥新。

我国文化起源于上古，大致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是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同时又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不断交流、渗透和大融合的结晶。

今天，我国正处在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百年大计、千秋功业，因此可谓当务之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要有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小学生和拥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和了解我国文化传统史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以更好地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应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我在大学教了大半辈子的书，我以为现在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正在慢慢下降，原因可能不在大学，而在中学，中学底子如果没打好，到大学再改造就困难一些。

书是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的精神产物。我们讲综合国力，书籍也要体现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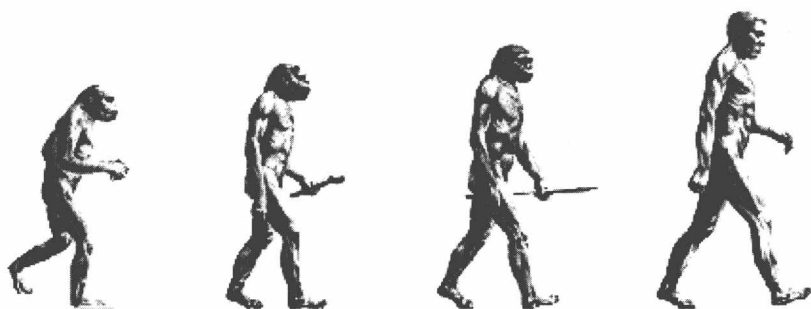
合效益。大专家写小文章是件好事，一本书几万字，看起来举重若轻，但背后有很多学问的支持，像演话剧，前台搭的东西并不多，其实后台有好多支持前台演出的东西。该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部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要走进全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要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们伟大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任继愈

2008年10月14日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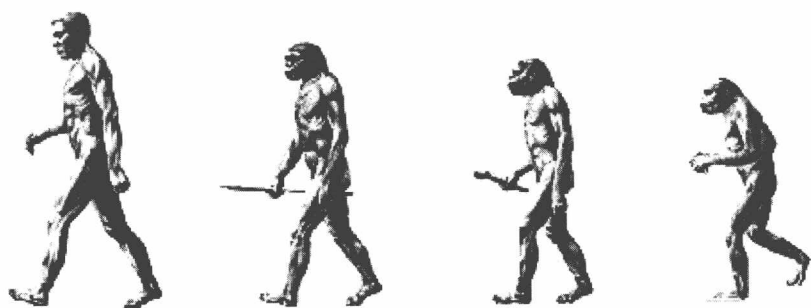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学生时代 · 001



第二章 初到周口店 · 011



第三章 主持周口店发掘 · 032



第四章 抗战岁月 · 042



第五章 重振周口店 · 056



第六章 流逝的岁月留下了什么 · 071



第一章 学生时代

1908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河北玉田县城北约七公里的小村庄——邢家坞。这个人口不足两百户的村子，北临山丘，南望一片平原，土地贫瘠，村民的生活比较贫困。

据坟地碑文记载，我们贾家原籍河南省孟县朱家庄，在明代初期才迁移到邢家坞。

听老一辈人说，我的曾祖有兄弟两人，大曾祖父没有儿子，按我们家乡当时的规矩，需要把我二曾祖父的长子，即我的大祖父过继给大曾祖父。我的二祖父也没儿子，又从我三祖父一门中把我的父亲过继给二祖父。由于生活困难，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只身到北京谋生。

我们村里有个叫宋竹君的，据说他是从燕京大学的前身——汇文大学（后改为汇文中学）毕业的，在北京英美烟公司任高级职员。经他介绍，我父亲也进了英美烟公司。父亲本名贾连弟，号荣斋。他工作的部门叫“调换处”，实际上是做一种广告性质的工作。人们只要能集到一定数量英美烟公司出品的香烟空纸盒或烟盒内的画片，就可以到调换处换取挂历、成套茶具及小玩意儿等物品。

由于工作日渐有起色，人来人往日渐增多，人们都习惯称父亲为荣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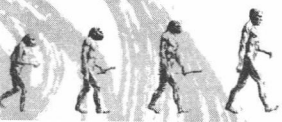
而他的本名反而没人叫了。当时父亲每月薪水 18 元，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需花 8 元，其余 10 元就托人捎回老家，家中的日子自然好多了。

我家村后的东山上有两个山洞，一大一小，我常常跟着其他小孩到小洞里探洞玩。大洞深不可测，我们从来不敢进去。我们有时把石头打成圆球，从山上往下滚着玩，想不到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发现石器的打制过程和用途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在村北的小山下，还有一条南北向的细长的水坑，这也是我们孩子们常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常在坑里洗澡、打水仗。我还常常到地里逮蝈蝈、捉蜻蜓和小鸟。在鸟中，我们最喜爱“红靛颏儿”或“蓝靛颏儿”，凡是我们网着的鸟，除了这两种，其余统统放生。当然我们小孩之间，也常常为逮鸟打架，母亲只是拉开了就完事了，最多打几下屁股。她不许我骂人，骂人准挨一顿掸把子。

我外祖母家在门庄子，位于邢家坞村和玉田县城之间，地处平原，风光秀丽，也是个两百多户的村子。外祖母住在村前街的西头路北，家中有五间北房。东侧一条路通往后街小路，东边有个数十米长、直通南北街的大水坑，水坑东西有三四十米长。前街路南有一块菜园，冬季多种大白菜，夏天除种各种蔬菜外，还种甜瓜、西瓜等。外祖母家我也非常爱去，除了有水坑可以游泳外，更因为那块很大的菜园子里有很多好吃的瓜果和蔬菜，比邢家坞的菜多了很多，何况还有一个比我大 13 岁的表兄，他常带我去水坑里摸鱼和捉螃蟹，又好玩又能解馋。

大约到 7 岁，我在外祖母家开始上学了。当地没有学校，读的是私塾。所谓私塾，就是在老师家上课。老师教几个学生，屋里没有课桌，只有个方桌，炕上放个炕桌而已。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





还记得，老师叫谷显荣。每天进老师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牌位行作揖礼，然后各就各位，背书或描红模子。学完了三本小书，又学了半本《论语》，谷老师因病去世了。我就到邻村跟一位叫“李小辫子”的老师学。当时已是民国，但他还是清朝打扮，留着辫子，所以当地人都叫他“李小辫子”，而不知他的大名。他对学生管得很严，背书背不下来或背错了，都要挨掸把子。他给我们讲的课文，我们听了有时虽然似懂非懂，但因怕挨打，背得都很熟。所以到现在什么“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大约到8岁，《四书》读完，又读了点《诗经》，我的外祖母去世了。此时邢家坞也有了私塾，我又返回自己的家继续读书。

应该说，我识字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戴明虽未上过学，但聪明而知晓大义。村里有个叫王雍的老头识字最多，他看的小说也多。每到夏天，大家在一起乘凉都会叫王雍讲故事。母亲常把听来的故事再讲给我听，都是一些“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之类的。母亲一边讲一边教导我要学好人，不要做坏事。后来母亲对小说也着了迷，就借来看，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王雍，天长日久，也认识了很多字，可就是不会写。到后来，她连不带标点的木版印刷的小说也能看得懂。

父亲在北京做事，家里有了活钱，生活自然好多了。母亲要求我穿戴不能与其他孩子有区别，我只比别的孩子多件内褂和内裤，外面仍是粗布衣裤。别人家的孩子在玩的时候都背着背篓，边玩边拾柴，母亲也叫我背一个，不要求拾多少柴，就是不能比别人家的小孩有特殊感。这对我作用很大，以至后来，我对待他人，不管职位高低，都能一视同仁，这不能不

说是母亲当年教育的结果。

虽然父亲每月捎钱来，但家里平时仍是早饭玉米渣粥加咸菜，午饭和晚饭是玉米面贴饼子加上一锅菜，有时是小米饭。当然，过节和有客人来时就不一样了。有时为了给祖父下酒，母亲会炒个菜，祖父总想叫我一起吃，母亲反对说：“小孩子家，吃喝时间长着呢！不在这一口两口。”过年时，客人给的压岁钱，都得如数上交，母亲又说：“孩子花惯了钱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但过年的新衣、新鞋母亲总是早早就做好，当然还有灯笼、鞭炮之类的玩意儿。所以过年是小孩子最盼望的了。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虽然家境不是很宽裕，但童年的生活非常愉快，无忧无虑。至今我还常常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我 13 岁那年，正赶上直奉战争，奉军溃败，逃兵很多。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到处抢劫，用他们的话说：“打是米，骂是面，不打不骂小米干饭。”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父亲对家里很不放心，他便决定抽时间回到家里探亲。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使他胆战心惊。他决定不在乡间久留，便雇了两辆骡子拉的轿车（即车上装个布围子），带着我的祖母、母亲、姑母和我及妹妹一起到北京暂避。轿车每辆可乘四人，乘一人或乘四人都需花 4 块银元。平常从老家到北京需两天的时间，这次走了三天，因为怕碰上逃兵，我们有时只好绕着道走。途中的栈房（能停车辆的小旅店）都被兵占据了，我们只好借宿到百姓家里。当时的百姓家对往来借宿的客人都很热情，供吃供住，还不当面收钱，客人要给钱就给小孩，借给小孩买吃的为名，还了这份人情，否则人家会说“我家不开店”，叫你下不了台。

进了朝阳门，到了崇文门外翟家口恒豫隆丝线店已是掌灯时分。当时





北京大多数人家还没装电灯，用的都是煤油灯。

我们的落脚处是父亲在我们来京之前预先托朋友找好的。这原是一家闲置的店铺，托恒豫隆代为照料。我们只占用了五间朝东的正房，其他房间还闲在那里。当时的人很迷信，住房子要看了风水才能决定，特别是作为买卖用的铺面房。我们临时租住的这幢房子，因有人说里面不干净，闹过鬼，所以很难租出去。租不出去，还要花钱雇人看管，房东当然愿意有人租这房子住，这样证明里面没有鬼；我父母又是不信神不信鬼的人，即使旧历年节也没烧过香或祭过灶王爷，这事对双方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时，我父亲辞去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作，在前门外打磨厂集资开了一片商店——义兴合纸烟店。店子的主要股东是义兴合钱庄，经理是个叫史冠德的山西人。纸烟店就在钱庄的东隔壁。

虽说父亲辞去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作，与别人合伙开了纸烟店，但并没有完全脱离英美烟公司，他专门负责批发英美烟公司出产的纸烟。当时这类烟店，京城共有四家，分布在北京四个区，每区一家专卖店，出售不许越界。当然父亲的薪金也比过去多了，年终还能分到红利。

在京呆了半年之久，地方上已经平静，老家的叔叔来京接我祖母等人回家。我母亲陪着祖母、姑母及妹妹一行人又返回了邢家坞。

妹妹贾英伯在家时也读了很多书，且非常聪明，《诗经》背得很熟。她本想留下来和我一起在北京读书，但因家人一走，我父亲便把原租住的房子退掉了，在纸烟店我们爷俩合着住，妹妹留下来挤在一起不方便，所以她不得不和母亲一起返回了老家。

母亲走后，我和父亲住在纸烟店里，并和店里的伙计一起吃饭。父亲把我送到打磨厂小学读高小。国文（即语文）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但数学

就困难了。因为在老家从未接触过阿拉伯数字，我学起来非常吃力。有时课堂上还涉及地理以及物理、化学等我完全没学过的知识，弄得我一点信心也没有，越学越没兴趣，最后还是离开了学校，在家请了一位先生为我补习。

父亲每天外出，我一人在店里，除了补习功课外也没其他事情可做，自己也不敢出去玩，很是寂寞。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多。这一年，正赶上崇文门内以东的汇文高等小学招生，父亲领我去投考。虽然除国文外其他各门较差，但经过一年多的补习，我居然也被录取了。我心里明白，这只是凭着运气，而不是凭着学到的知识。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就留了级。对我来说，留级不是什么坏事，从头再开始，学起来就省力多了，课能听得懂，成绩跟得上，学起来也感到有味道。就这样，我一直在汇文学校读到1929年高中毕业。

为了上学方便，父亲带着我从义兴合商号搬到了东城江擦胡同宋竹君家居住。父亲每月付给他一些费用。宋竹君是英美烟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是介绍我父亲进英美烟公司工作的人。后来他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弄得家境败落，我也不得不离开他家，搬到汇文学校住宿。听说后来宋竹君抽不起大烟，改抽白面儿，最后是家败人亡。

由于时间久远，汇文的住宿费记不清了，但我还记得伙食费分两种：一种伙食费较高，当然吃得也好，大约每月6块银元；一种次一点，粗粮较多，平时菜里很少有肉，只到星期天改善一下伙食。我记得伙食费是父亲领我去交的，收费人说：“差不了几个钱，还是叫孩子吃好的吧。”我父亲说：“还是次一等的吧。不在乎几个钱，可小孩不能惯，不能叫他与别人家攀比。”我心里虽不愿意，也只好听从。当然这为我以后不挑吃喝，对





在野外吃好吃坏不以为意打下了基础，这也不能不说是父母苦心教育的结果。

母亲回到老家后，祖父、祖母相继过世。这时我正在汇文读高小。北京四个区的英美烟公司的买办王兰（字者香）在骡马市一带建了一家独营店。我父亲又回到了英美烟公司（后改为颐中烟公司），职务为“段长”，比在调换处高了一等。工作是了解市面上纸烟的销售情况，并招揽广告生意，每月的收入有四五十元。此时，我父亲在崇文门外南五老胡同租了房子，因为没人照顾，就把母亲从老家接了来。我当然也不用住校了，回家来住不但能吃得好，也能省几个钱。

父亲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应酬也多了起来，每月收入所剩无几。我读到高中毕业，父亲没钱供我上大学了。此时我正当21岁，由父母做主结了婚。妻子叫王栖桐，与我同岁，是玉田县青庄坞人。她人品好，为人热诚。由于在农村长大，没机会学习文化，虽然很聪慧，但底子差，读书很吃力，渐渐地她对读书的兴趣也就没有了。但她一生中担负起了照顾公婆和子女的重担。

我在北京上学，学到了很多知识，开阔了眼界。当时，几位大文学家提倡白话文，虽然有不少人反对，但毕竟白话文逐渐占了上风。同时，新的思想也冲击着旧的封建思想。旧式的婚姻，我是反对的，一来我和妻子之间没有感情基础，再者我还没有工作，不曾立业，结婚和生儿育女会加重父亲的负担，所以我极力反对这门婚事。但母亲为此哭过几次，最后我只好投降。

婚后一年多，我的大女儿出世了。家里添了人口，虽然大家都很高兴，但我心里更加着急，总为自己不能挣钱养家觉得心中有愧。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曾约我跟他一起到外地报考邮政局的工作。我思想上有点活动，但母亲听说后，坚决反对，我也只好作罢。怎么办呢？这时我只想多学点知识，等待出路。于是，从1930年起，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

北京图书馆内无偿地供给白开水，有时我带着馒头夹咸菜，一去就是一天。开始看书没什么规律，逮住什么看什么，后来我对《科学》、《旅行杂志》之类自然科学方面的杂志和书籍越来越感兴趣。我不但看，还会把感兴趣的地方抄录下来。有时我也到旧书摊去浏览，看到便宜的书也会买回来。我对所看过的书都认真做了笔记，不知不觉，一年过来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玉田县狼虎庄有位名高焕、字灿章的人，是我的一个表弟。他经常来北京，每次来都住在我家里，几乎成了我家的一员。我的孩子也很喜欢他，因为他一来京，就常带孩子们出去玩。崇文门瓮圈的内侧有一家恒兴缸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他在这家缸店有股份。恒兴缸店的掌柜姓裴，就是1929年12月因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而闻名于世的裴文中先生的侄子。虽然裴掌柜辈分小，但岁数不小，比裴文中中年岁大得多。裴文中先生也常去缸店串门，和我的表弟时常见面，彼此很熟。

1931年春，他们在缸店又见面了。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闲谈中，我的表弟提到我闲在家里没事可做，只闷头读书。裴文中一听，说中国地质调查所正在招考练习生，不妨叫他去试试。高焕回来一说，全家都很高兴，因为这样既有了工作，还可以不出北京。

我风风火火地跑到位于西四兵马司9号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报了名。考试那天，主考的是地质陈列馆的负责人徐光熙先生。不曾想我在家中自学的知识竟派上了用场，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





上班后，我被分配到新生代研究室做练习生。和我同时来到新生代研究室的还有一位青年卞美年先生，他长我半年，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地质和生物。他是由他的老师——英国地貌学家、燕京大学教授巴尔博（B.Barbour）介绍来的。他是练习员，我是练习生；他大学毕业，我高中毕业。他的学历和职位都比我高，但他为人厚道，平易近人，我们很快就熟识了。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处处帮助我、指导我，至今我俩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当时新生代研究室有两处工作地点：一处是西四兵马司9号；一处东单北大街路西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室和108室。106室是裴文中先生的办公室，108室除杨钟健先生外，还有十几名工人在修理化石。上班那天，我俩先见了杨钟健和裴文中两位先生，他们言谈很和善，没有什么架子，使我们紧张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上班初期，我们没有一下子进入工作，因为杨钟健叫我俩先和大家彼此认识，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每天上午杨、裴都要到西四兵马司去。

一天，我和卞美年正在娄公楼108室聊天，卞美年在给我讲古代生物化石的知识。这时，走进来一位身材矮小、身着长袍的人，他在屋内转了一圈就走了。我俩不认识他，也就没有跟他打招呼。

第二天，杨钟健见到我们，说那是所长翁文灏，他叫我们俩明天上午去见他。我和卞美年心里一惊，感到对所长失了礼，心里直打鼓。

第二天上午，我俩按时来到了西四兵马司9号中国地质调查所，杨钟健已在那里等候我们。杨钟健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副主任，是我俩的领导。他把我俩领到二楼东南角翁所长办公室的门前，先带着卞去见所长。我在门外等候，心里就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多

久，卞美年出来了。由于翁所长有事，召见我改在下午。我问卞美年：“所长跟你说了些什么？”“他就问我学什么的，认不认识角砾岩，我说认识，我是学地质的。他又问了一些地质学上的问题，我都回答了。别的没再问什么。”“提到前天上午在办公室我们为什么没理他了吗？”“没有。他说地质调查所添丁加口是好事，所以他要接见我们。”下午，翁所长召见了我。见面时，我仍然很紧张。翁先生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我一一如实回答了。最后他问：“这种工作很苦很累，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呢？”我不假思索地说：“为了吃饭。”翁所长听后，忽然大笑了起来：“说实话好，好好干吧！”召见很快就结束了。谈话虽然很短，不曾想，翁的一笑，决定了我的终身。

第二天，裴文中通知我们回家准备好自己的行李。两天后，卞美年和我还有王存义先生就随裴文中去了周口店。我的工作也正式开始了，那就是协助裴文中在周口店搞发掘。

